

焦竑及其《玉堂丛语》

李焯然

—

焦竑，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淡园，南京旗手卫人，生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卒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1620)。嘉靖四十三年(1564)中乡试举人，万历十七年(1591)参加会试，中式进士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万历二十二年(1592)出任皇长子讲官。卒年八十一岁，赠谥德，赐祭荫子，弘光二年(1644)追谥文端。^①

焦竑在明朝以博学多闻见称，且好搜藏坊间典册，积书万卷^②，享誉于金陵之地。他的著作深为当时士人所推崇，“人人颂述”，“借观至于简渝传写，为之纸贵”^③。徐光启(1562—1633)分文章为三大类：大臣之文、朝家之文、大儒之文，谓皆“各有所益于世”，并认为能兼长备美的，在近世只有王守仁(1472—1528)，在当世只有焦竑。^④徐光启以焦竑和王守仁相提并论，这可见焦竑在当时的地位。焦竑早年曾从耿定向(1524—1596)学，其后复质疑于罗汝芳(1515—1588)，是明朝杰出的思想家。焦竑是王守仁、王艮(1483—1541)一派思想的后继者，他发挥了阳明学派“返求诸心”的理论，提出“取成于心”^⑤，“尽扫古人之乌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⑥。他的思想，又和其他的宋明理学家一样，揉杂了佛、道

思想,而且更认为三教实异途同归。他说:

夫老之有庄,犹孔之有孟也。老子与孔子同时,庄子又与孟子同时。孔子未尝攻老庄也,后之学者,顾诸诸然,沸不少置,岂以孔孟之言详于有,而老庄详于无,疑其有不同者欤?⑦

焦竑认为孔孟、老庄,其于“道”的追求,实异途同归,学者不应互相排斥。他又举了“南人食稻”和“北人食黍”为例,说明孔、老之道无异。他说:

食之于饱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相羨也。然使两者易地而食焉,则又未始相弃也。道之于孔老,犹稻黍之于南北也。⑧

他并进一步说“佛等于儒”,认为“道一也,在中国者曰孔孟老庄,其至自西域者曰释氏”,“乃知无儒无佛,无小无大,能大能小,能佛能儒”⑨。对于晚明学术思想的败坏,他主张天下一家,佛老同宗,以“西土”之教,补救“中土”之失。⑩可见焦竑的学术胸襟是比较博大的。晚明期间,西方学术借着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机会,开始在中国传播,焦竑虽然没有正式受到影响,但他对利玛窦(1552—1601)的学说表示欣赏。他的门人徐光启,秉承了他的学术态度,翻译西方典籍,传播西洋科技,为中西文化交流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焦竑是王守仁、王艮一派的后继,黄宗羲(1610—1695)编《明儒学案》把他列在《泰州学案》之中。泰州一系是晚明学术思想被攻击的主要对象,明清学者指斥为“姚江末流”,束书不观、空谈心性的“狂禅派”。焦竑虽然是泰州学系的中坚,但他却是一个“博极群书”的思想家。《明史》说他:

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驯雅,卓然名家。⑪

他又批评当时的士子“敢为高论而或疏于彝伦,喜为空谈而不求诸实践”⑫。所以他强调学术要“适世用”,指出“如何学道只是口说,

博求經以片紙志之併
 之中猶頃幸垂八十
 聰明不及於前時道
 德自負其初心不啻
 餽子所言者常一切

置之不理矣相知者惜
 其常為心思所及而廣
 之余不能止之積者僅
 身近日翰林記館閣類
 錄殿閣詞林死應制

集諸書而并存之六念
 之幸也夫
 萬曆戊午夏五滄園
 老人焦茲



書玉堂書語

余自束髮為覽觀
 國朝名公卿奉蹟迨
 溘等詞林元欣綜覈
 其行奉以待異日之

參攷此為史職第為
 歐陽公所云誇于四友
 野老而已者顧衡門
 為輩體秀道澗雖
 商一類節不肖降頽

凡人品之淑慝
 之得受
 朝廷之論建

圖一

玉堂書語目錄	卷之一	行誼 文學 古語
	卷之二	政事 登選 彙纂
	卷之三	召對 講讀 龍恩 禮祭 慶祭
	卷之四	祭會 佩印 集珍 訓政 忠節
	卷之五	職察 方正 廉介 義舉 器量
	卷之六	長厚 退讓 樞密 敏相
	卷之七	山處 師友 品藻 事例 科試
	卷之八	實譽 金獎 恬適 規誨 蒙天
		任達 夙惠 遊覽 術解 執術
		傷逝
		志異 簡傲 諧謔 儉吝 侈汰
		險澗 忿狃 刺殺 批漏 感瀟
		仇隙

圖二

口说不济事，要须实践”^⑬。并提倡“经世”之学。他说：

余惟学者患不能读书，能读书矣乃疲精力于雕虫篆刻之间。而所当留意者，或束阁而不观，亦不善读书之过矣。夫学不知经世非学也。经世而不知考古以合变非经世也。^⑭

可见他是认为学术是要实用和应世的，他根本反对游谈无根之学。焦竑是晚明学术思想界中最令人疑惑的思想家。从他的主张去看，一般人一定意想不到他是秦州的门徒。他一方面是讲阳明心性之学的出色分子，另一方面他又是明代以赅博见称的考证家。前人对焦竑的历史地位都未能作出合理的安排^⑮，近人对焦竑的研究^⑯使他续渐受到注意。焦竑的思想形态，代表了学术思想由晚明的心性之学转向清初考据学的过渡。

二

万历二十二年(1594)，大学士陈于陞(1545—1596)议修国史，焦竑协助其事，上《修史条陈四事议》，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充分表现出他的史学卓识。其后修史工作虽因陈于陞的病逝而中止，但他所完成的《国朝献征录》一百二十卷、《国史经籍志》五卷，已备受当时人的推崇。

《玉堂丛语》八卷，是焦竑最晚出的作品。大抵因为焦竑曾参加修撰国史的关系，所以有机会博览官方的纪录及时人的笔记著述，《玉堂丛语》便在这个情况下编辑而成。《玉堂丛语》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刊行，当时焦竑已经七十九岁。今可见的版本为明万历年间曼山馆刊本，卷前有焦竑题万历戊午(四十六年)序。曼山馆在万历年间刊刻的《玉堂丛语》有两个不同的校本，这证明《玉堂丛语》在当时曾两次刊行。去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出版的曼山馆刊本八卷，卷一内页题“太史琅琊焦竑辑，晋熙方拱乾校”，现台

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则另藏有题“钱塘徐象榘校刊”的曼山馆刊本八卷。方拱乾校本与徐象榘校本的刻排略有不同，而卷首焦竑的《书玉堂丛语》，虽然文字并无出入，且同样题万历戊午年，但书写格式并不相同。（见附图一）

《玉堂丛语》的编纂，焦竑在卷首《书玉堂丛语》中，说明其成书的经过：

余自束发，好览观国朝名公卿事迹，迨滥竽词林，尤欲综核其行事，以待异日之参考。此为史职，非第为欧阳公所云夸于田夫野老而已者。顾衙门前辈体势辽阔，虽隔一资即不肯降颜以相梯接，苦无以咨问，每就简册中求之。凡人品之淑慝，注厝之得失，朝廷之论建，隐居之讲求，辄以片纸志之，储之中箱。倾年垂八十，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其初心不啻韩子所言者，业一切置之不理矣。相知者惜其尝为心思所及而广之，余不能止也。^{①7}

可见《玉堂丛语》是焦竑观览典籍的笔记。《玉堂丛语》又可以说是《焦氏类林》的续编。焦竑在万历十五年（1587）曾编刊《焦氏类林》八卷，收集了他自四十一至五十岁的九年间的读书笔记，当时也是用“片纸志之”的方法完成。《焦氏类林》是仿宋刘义庆（403—444）《世说新语》的体裁，把收集的材料分类归目，并增删《世说新语》的三十六类为五十九类。至于《玉堂丛语》，“体裁仍之《世说》，区分准之《类林》”^{①8}，主要根据《类林》的分类方法，共分为五十四类。（见附图二）《焦氏类林》和《玉堂丛语》的分别是在内容上。《焦氏类林》所辑录的是前朝人物的佚闻事迹，而《玉堂丛语》是纪录当朝人物的遗言往行，自太祖建国以迄万历之世。关于《玉堂丛语》的内容，顾起元《玉堂丛语序》说：

其官则自阁部元僚，而下逮于待诏应奉之冗；其人则自鼎甲馆选，而旁及于征辟荐举之遗贤；其事则自德行政事文学言语，而微抚于谐谑排抵之卮言；其书则自金锁石室典册高文，而博采于稗官野史之余论。^{①9}

《玉堂丛语》所收录，是在朝士大夫的遗闻佚事，目的在“多识前言

往行”。材料的来源，则自金鑽石室的藏书，以至于稗官野史的记载。

三

从《玉堂丛语》的取材，充分证明焦竑“博极群书”的能力。《玉堂丛语》所辑录的数百条笔记史料，其中有部分是注明出处的。单就其注明的出处去统计，征引的书籍便多达五十余种，计有：《哀谈》、《怀麓堂稿》、《水东日记》、《东臯杂记》、《剪胜旧闻》、《三朝圣谕录》、《国宝新编》、《澹园集》、《琅琊漫抄》、《野记》、《冶城客论》、《殿阁词林记》、《今言》、《双槐岁抄》、《历代小史》、《寓圃杂记》、《延休堂漫录》、《陆俨山外集》、《琐缀录》、《古穰杂录》、《疏议辑略》、《治世余闻》、《国雅》、《畜德录》、《琬琰录》、《后渠杂识》、《言行录》、《余冬序录》、《南雍志》、《读书笔记》、《应天府志》、《濯亭笔记》、《南岳集》、《经济录》、《后寿藏记》、《柏斋集》、《国琛集》、《谈纂》、《耿先生集》、《西樵记》、《泾野内篇》、《刘忠愍集》、《松冈集》、《庚巳编》、《巳有园集》、《北窗琐语》、《名世类苑》、《维扬志》、《琼台类稿》、《升庵集》、《烟霞小说》、《应庵随录》、《说听》、《客座新闻》等。采览的广博，实令人惊叹。从所注明的出处去看，《玉堂丛语》所收录的材料，除征引自当时人的文集及笔记外，亦有取自碑铭和行状的记载。如卷六《出处》记庄泉的生平行事，注明出自“湛甘泉撰墓志”；卷六《师友》记刘基的学术渊源，注明出自“黄伯生撰行状”；卷七《夙惠》记杨一清的幼年教育，注明出自“谢纯撰行略”。可见焦竑的取材对象是非常广泛的。

《玉堂丛语》并无注明全部引文的出处，是美中不足的地方。然而，书中没有注明出处的引文，还是言必有征的。笔者曾就《玉堂丛语》所载有关丘浚(1418—1495)的五条史料为例，进行追查，

发觉都可以找到出处：卷一《文学》记丘浚之文章风格，见于雷礼《国朝列卿纪》；卷四《纂修》记丘浚之著述，采自黄佐《大学士丘公浚传》；卷八《刺毁》记丘浚与刘健之不和，出自陈洪谟《治世余闻》；卷八《刺毁》记丘浚评庄泉之行为，出自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八《刺毁》记丘浚制饼以谀上，见于《皇明世说新语》。故《玉堂丛语》可说是集明人笔记史料的大成。郭汝荐说是书“宛然成馆阁诸君子一小史”，“补苴国史之弗备”^{②①}，其价值可见一斑。而且，在编纂的过程中，焦竑对材料的选择，相信是比较严谨的。其中有两条引文，焦竑附了按语。如卷三《宠遇》记杨文贞之妻早丧，太后制封其婢以配之，按曰：

征明云：“文贞薨时，夫人犹在，且不闻有封婢之说，或他日以导推恩容，或有之。”按文贞元配严夫人，继郭夫人即此婢也。朝廷特降制封之，其制词载在文贞《续集·附录》内，安得云无，衡山一时未之考耳。^{②②}

卷八《纰漏》记陈尝访某官家所发生的事，按曰：

此节与北齐刘仪同相类，初疑讹传，及闻蔡林屋云：“尝见吴匏翁述之为笑谈”，乃信真师召事也。^{②③}

可见焦竑并非只从事采辑的工作，其间亦力求资料的真实可靠。顾起元说是书“义例精而权量审，闻见博而取舍严，词林一代得失之林，煌煌乎可考镜”^{②④}，是非常中肯的说法。其次，《玉堂丛语》的编纂，并不是徒为辅谈的参考，早在焦竑仿刘义庆《世说新语》编刊《类林》时，姚汝绍已指出“刘氏主在辅谈，弱侯欲以为训意”^{②⑤}。焦竑论学以经世致用为依归，故《类林》的编纂，目的在以古为训，而《玉堂丛语》则欲通过多识先哲前贤的遗言往行，引为鉴镜。此如顾起元所说：“折衷是非，网罗文献又其余事”^{②⑥}。焦竑虽然并未在文中加上他自己的评论文字，但从他的分门和归类，已显示出他对人物的褒贬。

四

《玉堂丛语》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珍贵的笔记史料，从他所征引的书目来看，部份现在已经不容易看到，焦竑的收集和挑选，使明代稗记史乘，赖以流传，且总成一编，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可惜《玉堂丛语》的流传并不广泛，一直未受到明史工作者的注意。研究明人传记的几种主要工具书：田继综编《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索引》（一九三五年北平哈佛燕京学社出版）、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编《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一九六六年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Fang Chao-yi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都没有利用《玉堂丛语》所保存的史料。一九五九年北京中华书局计划出版《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当时计划出版的书籍包括：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叶子奇《草木子》、叶盛《水东日记》、何良俊《四友斋丛说》、陆容《菽园杂记》、焦竑《玉堂丛语》、田艺蘅《留青日札》、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谈迁《枣林杂俎》，后来只出版了《南村辍耕录》、《草木子》、《四友斋丛说》、《万历野获编》四种，其他的五种则尚未有机会看到。一九八〇年上海古籍书店复印曼山馆刊本《玉堂丛语》八卷出版，豪华线装本八册一函，但因印数有限，且售价昂贵，所以并未引起读者的注意。近悉中华书局将出版《玉堂丛语》的平装普及本，这毕竟是明史研究者的一大喜讯，我们深切期待着《玉堂丛语》平装本的早日面世。

一九八一年六月脱稿于澳洲国立大学中文系

注：

- ① 关于焦竑的生平，可参阅：《明史》卷 288，页 7392—7394，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版）；Arthur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pp. 145—147 (Washington, D. C: Library of Congress, 1943)。
- ② 详参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页 201（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版）。
- ③ 顾起元《献征录序》。见《国朝献征录》卷首（台湾学生书局，1965 年据明万历年间刊本重影）。
- ④ 徐光启《澹园续集序》。见《澹园续集》序 2，页 4a（翁长森辑《金陵丛书》本，1914 年版）。
- ⑤ 《澹园集》卷 20，《罗杨二先生词堂记》，页 13b（《金陵丛书》本）。
- ⑥ 《焦氏笔乘》卷 2，页 4（台湾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本，1971 年版）。
- ⑦ 《澹园集》卷 14，《庄子翼序》，页 11b。
- ⑧ 《老子翼》卷 2，页 45a（台湾·艺文印书馆，《无求备斋老子集成》本，1965 年版）。
- ⑨ 《澹园集》卷 17，《赠吴礼部序》，页 12a。
- ⑩ 详参《澹园集》卷 12，《答友人问》，页 12b；卷 47，《崇正堂答问》，页 9b。
- ⑪ 《明史》卷 288，页 7393。
- ⑫ 《澹园续集》卷 2，《神交馆集序》，页 21a。
- ⑬ 《澹园集》卷 47，页 6a。
- ⑭ 同上书卷 14，《荆川先生右编序》，页 15a。
- ⑮ 胡适承认焦竑是一位考据学家，所以认为他是属于朱熹思想的模式（见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载《胡适文存》，第 1 集，页 383，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71 年版）；梁启超指出焦竑是阳明心学的出色分子，但他对焦竑的博学，又不能加以解释（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1 章，页 10，台湾·华正书局，1974 年版）。
- ⑯ 近人对焦竑的专题研究，较早的有容肇祖《焦竑及其思想》（载《燕京学报》，第 23 期，1932 年）、内藤虎次郎《焦竑の目录学》（见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页 368—370，东京·弘文堂，1950 年版）。近年的研究有 Edward T. Ch'ien, "Chiao Hung and the Revolt against Ch'eng-chu Orthodoxy" (in William T. de Bary ed.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pp. 271—30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李焯然《焦竑之思想与史学》(香港大学中文系论文,1978年)、Edward T. Ch'ien, "The Late Ming Neo-Confucian Synthesis in Chiao Hung"(Unpublished Ph. D. thesis, Columbia-University, 1978)。

- ⑰ 《玉堂丛语》序 3, 页 1_a—2_a (上海古籍书店, 1980 年版)。
- ⑱ 《玉堂丛语》序 2, 郭汝荐《玉堂丛语序》, 页 1_b。
- ⑲ 《玉堂丛语》序 1, 页 1_a—_b。
- ⑳ 同注⑱, 页 3_b。
- ㉑ 同上书卷 3, 页 25_b。
- ㉒ 同上书卷 8, 页 32_a。
- ㉓ 同注⑲, 页 2_a。
- ㉔ 《焦氏类林》卷首, 姚汝绍《焦氏类林序》, 页 1_a (见《粤雅堂丛书》第 262 册, 南海伍氏刊本)。
- ㉕ 同注⑲, 页 3_a。

《诗·黄鸟》揭露残酷的殉葬制度

《黄鸟》一诗, 记述了“三良”随秦穆公殉葬之事。秦穆公(? ——前 621) 春秋时秦国国君。史载, 他死时, 包括三良奄息、仲行、鍼虎在内的有一百七十七人随葬。全诗不仅表现了人民对“三良”的同情, 同时揭露统治者的罪行, 反对残酷的殉葬制度。

《黄鸟》三章章十句, 每章只换二字, 句法、结构相同。其第一章意思是说, 被迫从秦穆公殉葬的子车奄息, 是百夫中的人杰, 当他走到了他坟穴的旁边, 是多么的惴惴恐惧。诗人责问苍天, 为什么把这样的好人害死……! 后两章是写: “子车仲行”、“子车鍼虎”殉葬的事。

在残酷的奴隶制度下, 奴隶随时都可能惨遭杀害。从殷商至秦始皇时代, 许多奴隶就成为人祭、人殉的牺牲品。奴隶主死后, 要用奴隶殉葬, 少者一、二人, 多者几十乃至上百人, 有时在墓前还要杀死许多奴隶, 祭祀死者。

· 中原 ·